



新中国成立前被授予少将的外交家伍修权

□ 焦利萍 武 星



伍修权1908年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贫困家庭，1923年走上革命道路，曾参加长征、列席遵义会议，参与筹建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和第一所海军学校。1945年9月，为方便与苏军的接洽接收东北事宜，伍修权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就被授予军衔的革命将领。新中国成立后，伍修权转战外交领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将军外交家。

留学苏联，辗转回国

1921年，伍修权进入武昌高师附小接受教育，在那里遇到了党的创始人之一陈潭秋。在其影响下，伍修权于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任该校第一个团小组组长，物色志同道合的青年加入团组织并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925年在党组织的推荐下，与其他10名同学一起赴苏留学，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了两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因归国通道被切断而滞留莫斯科。其间蒋介石的叛变、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革命不掌握武装不行，于是中共中央决定从上述原拟回国的学员中抽选一批人转入苏联各军事院校，为党领导的军队培养经过正规教育和训练的军事人才。基于国内作战形式主要将是游击战争的判断，伍修权选择进入莫斯科步兵学校接受训练。

1929年，伍修权被分配到位于伯力的苏联边疆保卫局工作，之后

成为联共（布）候补党员。当时，他的生活待遇优厚，日子过得相当安定舒适。但伍修权心系国内革命，多次向组织提出回国请求，却都未能成功。后来，他编了一条理由征得上级领导的同意来到莫斯科，找到共产国际机关中的中共代表团提出自己的回国请求，又找到苏共中央组织部才被批准回国，最终几经辗转于1931年回到国内。

转战南北，参与海空三军院校建设

伍修权到达上海与党组织接上头后，即由联共（布）候补党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之后便被派往苏区。在苏区他先后参与了第三、四次反“围剿”作战，还参与了瑞金红军学校的创建工作，协助刘伯承编写教材并担任了射击课教员。其间，他将自己训练有素的军人作风和所掌握的知识、技能充分运用到教学、训练的言传身教中，而且工作态度热情、积极、虚心。1933年，伍修权受命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当翻译。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随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在1935年列席了遵义会议。

1938年2月，伍修权任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处长。他利用其公开合法的身份，帮助指导党的地下组织培训干部、发展党员、扩大组织；接送了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等党的领导人和大批革命者，使办事处成为我党在西北地区的一处“战斗指挥所”和“革命接待站”；作为延安和苏联联系的主要通道，接收和转运了大量抗战物资。1941年7月，伍修权返回延安，担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上任之初，他首先抓司令部建设，建立了正规化的

司令部工作秩序。1945年参与起草了朱德在七大的军事工作报告。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派伍修权赴东北工作，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等职。1946年6月，任军调处执行部长春分部我方负责人，同国民党及美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党的军事、政治斗争。他还担任东北军区军政学校校长，参与筹建了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和第一所海军学校，为空军、海军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在1949年毛泽东访苏时，他负责了途经东北时的保卫工作，这也是他在东北军区参谋长任上最后一项任务。

脱下军装，驰骋外交战线

1950年，伍修权受周恩来急召回到北京，随后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随周恩来赴莫斯科参加新中国首次重大外交活动，直接参与了一批俄文资料的翻译和分析，筹备并亲历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在毛泽东访苏回国之后，与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与苏方进行若干单项协定和具体协议的会谈与签约工作，奠定了中苏合作的基础。同年11月，他作为大使衔特派代表，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出席联合国相关会议。在会议发言中，伍修权驳斥了“台湾地位未定”“中立化”以及“托管”等谬论，并在发言指出：“说是由于对日和约尚未订立，台湾的地位不能决定，应该由联合国审议的一切说法是同历史开玩笑，同现实开玩笑，同人类

的常识开玩笑，同国际协定开玩笑，同联合国宪章开玩笑，是杜鲁门总统同杜鲁门总统自己开玩笑的荒谬绝伦的不值一驳的笑话。”这次发言气势恢宏，好像要把中国人民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满腔怒火喷发出来。

1950年12月，伍修权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之后负责中国政府正式接收旅顺、大连回归的具体组织与实施工作以及苏联援华专家的统一管理。1955年中国与南斯拉夫建交，考虑到南斯拉夫状况的复杂性，需要派一位政治地位高且经验丰富的的人担任大使。伍修权认为自己从事外交已有四五年，很少出去，应该到外面去积累外交工作的实践经验，而且由于南斯拉夫情况复杂，正好可以锻炼自己。于是，他便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去南斯拉夫赴任。担任大使期间，伍修权对南斯拉夫各方面进行了客观、全面的考察，实事求是的分析，不但确立了使馆大力推进与南斯拉夫发展正常关系的认识基础，也为国内正确看待南斯拉夫、制定对南斯拉夫方针提供了客观依据。1958年，伍修权任中联部副部长，从事与兄弟党的政党外交活动。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出席兄弟党会议经常受到苏联带头挑起的批评，伍修权率随的代表团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尊严。

1975年，伍修权重返军队并出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参二部部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认真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决议，拟制了新时期情报、外事工作方针和规划，主持修改了军队外事工作的有关规定，加强了国际战略形势的调查和综合研究，为党中央、中央军委若干重大决策提供了依据。1997年11月9日，伍修权在北京逝世。

题，习近平主席从理想信念、党性原则、革命精神、组织纪律、思想作风等方面深刻剖析了原因，强调“我军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前进不能停滞，只能积极作为不能被动应对”，提出了“四个站起来”“五个着力抓好”等治本之策。可以说，全面拉开了政治整训的序幕。以这次古田会议为分水岭，新时代伟大斗争打开了新局面，党的权威和核心日益巩固，优良传统和作风得以强势回归。

守正创新、笃行见效，弄清楚为什么能够成功、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开辟新征程上牢记“三个务必”、践行“两个维护”的新局面

胜利从古田开始，历史从古田再出发。两次古田会议，可以说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姊妹篇”，孕育了人民军队的两次伟大出发。古田全军政工会议，可以说是开启了新时代政治建军的上篇文章，为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命了题”“开了局”。紧接着，召开的全军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和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基层建设工作会议、人才工作会议等重大会议，则是系列下篇文章，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一体贯通，全面开启了强军兴军新征程。全军官兵沿着习近平主席擘画的新时代强军方略勇毅前行，强军事业爬坡过坎、面貌一新、捷报频传，不断从成功继续走向成功。回望古田重温历史，就是要汲取“永放光芒”的真理力量，弘扬政治优势，牢记“三个务必”，增强政治能力，争做“两个确立”的坚定捍卫者、“两个维护”的坚定拥护者，努力在强军兴军伟大征程上书写新的时代篇章。



1950年3月12日开始的西昌战役，我军解放18城，歼匪一万余，击毙匪兵团司令，把国民党赶出了大陆，结束了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统治，同时，解放了大小凉山，使凉山人民走上了“一步跨千年”的康庄大道，具有重大而独特的历史意义。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祖国大陆对国民党军的最后一仗，也是一场在民族地区进行的政治仗、军事仗。

一场杀敌诛心的政治仗

西昌虽小，自古却是兵家必争之地。它位于西南主要平原之一的安宁河平原上，群山环绕，易守难攻，被称作“蜀滇咽喉、西南雄镇”。由于地形十分险要，蒋介石对西昌早有打算，曾亲自到西昌进行过勘察和部署。1949年11月初，人民解放军发起西南战役后，蒋介石决定把西南战场的指挥中心移到西昌，架设了两部电台，担负起了大陆和台湾电讯中枢的作用。

成都战役前后，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固守西昌3个月，企图在西昌建立游击根据地，梦想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争取英美等国际力量的支援。为此，蒋派遣顾祝同飞赴西昌与胡宗南商定固守计划，召开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次最高军事会议，制定固守西昌的方案，并传达蒋介石“死守西昌”的指示。此后，7次40架次派飞机从台湾给西昌运来大批武器弹药和金银。西昌成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军事基地，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的最后堡垒。

为彻底摧毁国民党残余势力，1950年2月下旬，毛泽东向西南局、西南军区发出命令：“立即发起西昌战役，粉碎蒋介石的迷梦，摧毁西南土匪的依托，彻底解放大陆。”

西南军区立即行动起来，着手做好西昌战役各项准备，特别是做好战前思想动员，让广大官兵明白这场战役的重大意义。1950年3月3日至5日，第44师在曲靖地区召开了第二次全师党员代表大会。军长、政委亲临大会作动员，号召部队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执行好政策，坚决克服困难，完成任务，人人争取新的光荣，并将一面写有“祖国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勇敢愉快地到哪里去”的锦旗授予该师。会上，师长向守志对全师的党员代表们说：陈赓司令员把消灭大陆国民党军的最后一仗——解放西昌的任务交给了我们，这是对我们44师的最大信任！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纷纷表示：坚决响应兵团和军、师党委的号召，带领部队完成好任务，为军旗争光！这也掀了解放军粉碎蒋介石固守西昌、等待反攻迷梦的序曲。

一场速战速决的军事仗

3月4日，解放军西南军区向所属部队发出命令：决定以西康军区之184师及云南军区之44师为主干，联合其他部（分）队进行西昌战役。于是，驻川西的第184师由北向南，对西昌发起正面进攻；驻云南的第44师、第43师各一部等，由南向北对西昌实行包抄、夹击，南北两路部队采取多路开进、层层包围的战略战术，发起西昌战役。

北路部队第184师在师长林彬、政委梁文英率领下由温江出发，分三路向西昌方向南进。23日攻占富林，24日强渡大渡河，追击国民党军第335师南下，并顺利通过彝区。

南路部队第44师兵分两路，由南向北直取西昌。渡过金沙江后，第130团乘势解放会理。第131团渡江后，向宁南挺进，连续两昼夜没有饭吃、没有水喝，许多战士只能以尿解渴。在翻越上下60里的黄土岭时，由于山陡路滑、风力很大，有的行军锅和背包被大风刮跑，2名战士被大风刮到崖下。为此，战士们互相以皮带拉着翻山越岭，奋勇前进。在“一分艰苦，一分光荣”的口号鼓舞下，战胜了困难，于23日占领了宁南县城。25日，解放德昌，与南下的184师共同完成了对西昌守敌的包围。

当我军进抵距西昌约15公里时，胡宗南、贺国光等连夜仓皇乘两架飞机向海南逃窜。据后来俘虏供认，胡宗南等出逃的飞机每架只能运送20余人，却有数百名敌军官和家属蜂拥而

歼灭大陆国民党军最后一仗——西昌战役：

□ 匡小文

上，连机舱门都关不住，最后只得鸣枪才把抢乘人员驱散。正在城内静候命令的西昌军政长官公署的官员们一听到飞机起飞声响，得知胡已经逃跑，立即乱作一团向泸沽方向逃窜。27日5时许，第44师第132团从西面迂回，先攻占了飞机场，随即进入西昌城内。残敌四散，一部北逃，一部流窜于西昌附近山区。第132团不顾疲劳继续追击，并与第184师会师冕山。西昌解放后，敌第124军军长顾介侯等率残部2000余人，西渡雅砻江，向滇西逃跑，妄图流窜国外，被我军左翼第14军部队歼灭。至此，西昌战役结束。

西昌战役中，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予敌沉重打击，共消灭国民党第5、第7两个兵团部，5个军部和宁雅联防司令部、宁远靖边司令部及所属部队。毙、俘、投诚少将以上军官30余人，团以下官兵1.56万人，投诚起义2500余人。

一场收土归心的民心仗

西昌战役快结束时，国民党军四处逃窜，在战场上丢下不少枪支弹药，还有少数残匪钻进了山林。在第184师协同下，第44师开始组织清剿散匪。由于大力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召开各县、市有影响人士的土司、头人座谈会；部队深入群众，以实际行动感化兄弟民族同胞，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很快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增强了民族团结。彝族人民把部队看成是自己的子弟兵，主动报告匪情当向导，积极协助我军肃清残敌。他们每次送武器弹药到部队，剿匪部队都以礼相待，请他们吃饭，军民亲如一家。后来第44师撤离西昌去执行川滇黔边剿匪任务时，当地彝族群众用他们最高的礼节——跪着欢送解放军。

刚开始，向守志看到来自十里八乡的老百姓跪在路边，一时不知怎么回事，正要下马劝阻，当时彝人头领急忙对他解释说：这是彝人对最尊贵的客人的最高礼节。他们只好喊着“感谢彝族同胞热情欢送”含泪从跪着的人群前通过。

西昌战役解放了西昌地区及毗邻的18座城市，越西、会理、宁南、雷波、昭觉、西昌等地区还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为凉山废除奴隶制度、完成民主改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从此，千百年来的奴隶制度开始动摇，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还是文化、思想等领域，凉山地区都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随着西昌战役的胜利和凉山人民的解放，凉山的人民“一步跨千年”，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读懂两次古田会议的厚重意蕴

□ 张 钧

我党我军历史上有两次著名的古田会议，可以说是两次伟大的转折。1929年的古田会议，立起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2014年的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立起了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一次定型、一次重塑，一次新生、一次重生，根本上都是解决从思想上政治上掌握和建设军队的问题，其实质都与维护党的权威和核心紧密相关。今天，我们弘扬古田精神，就是要读懂其中的政治意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看清来路、找准初心，弄清楚从哪里来、为什么出发，从而强化“忠诚谁、维护谁”的历史自觉

1929年，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就到底“归谁领导、听谁指挥”这一原则问题发生了争论，部分同志产生了“革命向何处去”“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问。危急关头，毛泽东力挽狂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要领导军队，并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上首次以党的决议的形式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使党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初步实现了理论化、制度化、规范化。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主席决策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2014年10月31日，他亲自在古田主持和出席这次重要会议，开宗明义指出会议目的是寻根溯源，深入思考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郑重明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整风精神，研究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的重大问题。

历史回过头来看，往往显得更透彻。这两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都是在历史重大关头带有拯救

和转折的性质。第一次古田会议在红军面临分裂溃散甚至变色的危急关头，带领红军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建军方向，为无产阶级革命军队定了型。新古田会议在当时流毒浸染、积弊缠绕的危急关头，带领人民军队重整行装实现了浴火重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初，反四风取得明显成效，但一些思想积弊还很深，正风肃纪尚未形成压倒性优势，很多人还在徘徊、观望。这时候，通过召开古田会议进行思想重塑和初心重换，对深入彻底肃清流毒排除隐患、巩固党的权威和领导，无疑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回归本真、拨乱反正，弄清楚什么是“本”、如何“确立”，从而把错误的东西纠正过来，把带根本性的东西立起来

事非经过不知难。当年古田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在闽西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对大革命的失败和当时面临的形势作了深刻剖析。为什么会出现各种混乱和纷争，当时的军委和前委之争、政治与军事之争以及红四军内部之争，说到底还是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之争。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毛泽东洞察透彻纷争的本质，按云见日、扶危定倾，鲜明立起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原则，坚决批判当时存在的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把党性原则、阶级立场庄严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确保了军队建设乃至党的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

从2013年开始筹备古田全军政工会议，最终聚焦定格在四个字：问题导向！直面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问题破题开局，以破正本，归正根本！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着眼研究解决党从

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的突出现实问题，9个部分除了总论都坚持破立并举，立起什么、纠正什么一目了然、立场分明。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会议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强调把理想信念、党性原则、战斗力标准、政治工作威信4个带根本性的东西在全军牢固立起来。这可以说是开启了新时代又一次思想解放，立起了政治工作时代主题，立起了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立起了强军兴军的政治保证，为“两个确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刀口向内、敢于斗争，弄清楚向哪里去、怎样再出发，以整风整训的斗争品格和自我革命精神做到“真追随”“真维护”

真理不辩不明、不破不立。当年古田会议召开前，有好几轮思想交锋，拉开了红四军内部争论和斗争的序幕。后来，红四军又进行了著名的“新泉整训”，为古田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思想准备。直到古田会议上，毛泽东代表前委作政治报告，通过了8个决议，就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严肃党内生活、整肃党的纪律立起一系列基本规范。反观这一过程，无不是斗争的结果，以积极的思想斗争拨乱反正，这是古田会议的历史贡献，也使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更加成熟。

再看新古田会议，习近平主席在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肯严厉，语重心长地点出了部队中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点名道姓，见人见事，振聋发聩，深刻指出这些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否则军队就有变质变色的危险”。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